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四十六辑（总第一四六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 7-5034-1186-4

9 787503 411861 >

ISBN 7-5034-1186-4/K · 0820 定价：13.00元

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十六辑（总第一四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A097042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 146 辑/全国政协文史委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11
ISBN 7 - 5034 - 1186 - 4

Ⅰ. 文… Ⅱ. 全… Ⅲ. 文史资料 - 中国 Ⅳ.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657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刷: 北京樱花印刷厂
装　　订: 兴杨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数: 185千字
印　　数: 4000册
版　　次: 200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3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目　录

青年忆旧

我的回忆片断 …… 周士观（1）

蒋军秘闻

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两次会议 …… 陈远湘（18）
蒋介石的一次军事部署 …… 廖耀湘（21）
1946年春蒋介石对东北的阴谋 …… 范汉杰（24）
1946年召开的徐州会议 …… 韩　浚（27）
《搜索要领》梗概 …… 刘中权（35）

经济史话

爱国实业家的楷模唐君远 …… 唐翔千（40）
回忆通易信托公司 …… 李文杰（51）
“蛋大王”郑源兴 …… 崔蔚人（73）

边陲轶事

伊盟事变经过 …… 陈长捷（103）
预七师伊犁被歼回忆 …… 蔡毓奇（11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教史苑

天津时代的《大公报》发展史话…… 汪松年（木公）（128）
回忆抗日战争前的山东乡村建设 …… 陈亚三（151）
日军强占燕大的前前后后 …… 曹增群（166）
师大复员返平团的回忆…… 徐英超（171）
“开国纪念贫儿教养院”忆述 …… 仝菊圃（176）
关于中国普罗世界语者联盟的一些回忆…… 张企程（184）

人物述林

先祖邵积诚公事略 …… 邵循恕（190）
何键其人其事 …… 陆承裕（196）
我所知道的廖耀湘 …… 李以劻（225）

补充　订正

读《李济深先生略历》书后 …… 梁漱溟（237）

我的回忆片断

周士观*

1959年，周总理曾经要求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写自己的亲身经历，传之后代，以供历史研究者之参考。

我当时已经年逾60，但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写过什么。其原因一是怕写不好；二是有些事写出来，又怕有自炫之嫌。因而迟迟不愿动笔。

现在我已90有余，回忆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香港等处的一些活动以及在周总理和董老领导之下做的一些策反工作，虽然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并且都已成为历史陈迹，但记录下来，仍可以供后人了解一些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迹象和动态。因就回忆所及，拉杂写成下列片断。

一、我在重庆时的一些政治活动

1937年以前，我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五

---

* 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5年后，任重庆弹子石机器厂管理处总经理、上海中国工矿银行总经理。建国后任政务院参事，民建第一届中央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副主席，是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至六届全国政协常委。1984年逝世。

路总指挥马鸿逵的驻南京代表，和国民党的军政人员接触较多。1937年抗战以后，我又被甘肃省推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参政会的组织除了各省推派的代表以外，各党派都有代表参加。也有一些社会知名人士。中国共产党也有好几位领导同志参加。从此以后，我的活动面也就更加广泛了。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转移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在丧失大片土地之后，不积极团结各种力量，励精图治，反而更加腐化，更加独裁。这就引起了后方广大人士的不满，并逐渐地形成为一种中间的势力。

这个中间势力，包括着抗战以前早就存在的几个小的党派和一些无党派的爱国民主人士。他们的共同愿望，是期望国民党能够放弃独裁，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我本人也不例外。但我当时并没有具体的成熟的主张。

我当时代表西北的实力派“四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青、马步芳），因此有些党派就想邀我参加他们的组织，以便在某些方面或可得到一些帮助。我自己也开始和各党派的负责人分别接触，以便决定我自己的道路。

我先和沈衡老接触。沈钧儒先生在民主党派的上层人士中，被党誉为左派的旗帜。他的爱国心的炽烈和态度的坚决，确非当时别的一些人所能企及。然而我以一个温和派的眼光，却把他的坚决看作是偏激。因而没有能够和他进一步接近。

接着我去访问民社党的张君劢。张君劢是我国有名的教授，也是著名的法学家。他的国际知识非常丰富，对国际情况也确实了解。但对国内问题则比较模糊。因此，在许多国内问题上他的意见我认为不正确，且常常为蒋介石的心腹张群和他的弟弟张公权所利用，拿他作招牌。我认为这是他本人的弱点，也是民社党的致命伤。所以当他派蒋匀田和他的妻弟陈某（是我的朋友）邀我参加民社党并允将来以国府委员畀我的时候，我就婉言谢绝，并劝他不要为张群和他的弟弟所利用。

在蒋介石悍然要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我劝他不要参加，并劝他向蒋介石建议取消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我认为那是只能增加纠纷而没有多大意义的事（当时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也在场）。张君劢认为我的意见可以考虑。可是后来他还是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成了蒋政权的殉葬品。

同青年党的三个头脑——曾琦、李璜、左舜生，我都有接触。青年党是国家主义派的组织，它建立于五四运动之后不久，成立之初提出的口号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这原未可厚非。但它建立以后，即专以反共为目的。曾琦讲，他们的党所以名为青年党，是认为青年是社会的新生力量，因此应以青年为基础；但他们的青年党却又一直和反动的官僚政客军阀相勾结，这就证明他们是些言行不一的政客。他们几个头脑给我的印象也不大好。曾琦类似一个老学究；李璜则性情暴躁，动辄就发脾气。一般来说，这是很难在政治上站住脚的。

左舜生给我的印象较好。他是大学教授，研究过历史，对国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他们的党既以反共为目的，则最后必然要和蒋介石合流。果然，后来青年党终于参加了国民党召开的国大，左舜生也干了几天短命的部长。他们的党也就从此以一个帮凶的身份消失于政治舞台。在他们将要参加伪国大的时候，曾要我参加青年党，并允给我两个立法委员的名额。我拒未应允。否则我也早和他们落个同一的下场了。

当时我接触最多的是农工党的章伯钧，并且在经济上帮助过他。

章伯钧有股闯劲。不管在什么场合，他都敢闯。他原来跟邓演达组织了第三党。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之后，他倒能坚持立场，一直继续反蒋。但我感觉他很不稳妥。有一次他请我到他的重庆半山村寓所吃饭。他说要把第三党改为农工党，以农民、工人和科学技术人员为基础。我曾经劝他不要这样做。我说：“你这样搞，不是和共产党争群众吗？”可是他并不接受我的意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底还是改名为农工民主党了。

他曾极力劝我参加他所领导的农工党。他的目的是想通过我的关系去拉拢西北的“四马”，作为他的实力后台。我也没有接受。我说：“我有我的工作，如果参加你们的组织，万一我的工作出了乱子就会影响到你们的组织的。”就这样，我也谢绝了。

在了解了各党派的情况之后，我觉得我应该暂时采取超然的态度。所以在1939年11月间沈钧儒、章伯钧、梁漱溟、李璜、黄炎培等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时候，李璜起草章程，并拟推我担任“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执行委员，我便辞不接受。我虽没有接受“统一建国同志会”执行委员的名义，但该会的许多活动我都参加，而且该会的通讯处即设在重庆南岸弹子石操坝子巷30号我的办事处之内。

后来梁漱溟、黄炎培、李璜、章伯钧等又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我认为他们这些人都原有一个小的党派，他们参加政团自然名正言顺。我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只是单个人，怎么能参加一个所谓“政团同盟”的组织呢？所以也没有参加。后来民主政团同盟改为民主同盟，他们聘我和施复亮、章乃器等为政治顾问。所以当时一般人认为我也是民盟盟员，事实就是这样。当时的报纸也登载过。

二、向党靠拢和参加军事策反工作

抗战以前，我对中国共产党很不了解。对中国革命到底应该走什么道路也不清楚。1926年，我受山东省公署的派遣，到欧美几个国家考察军事工业。到欧洲不久，国内就发生了北伐战争。从国内得到的零碎消息，北伐战争真是轰轰烈烈。可是，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到底怎么样？共产主义在中国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在我的脑子中成了一个大问题。所以在我回国的时候，特意绕道莫斯科，想对俄国革命进行一些了解。

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个星期，看了一些表面的情况。当时苏联虽然已经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但生产仍很紊乱，饥饿现象还是非常严重。党内的派别斗争也十分惨酷，给了我一些不好的印象。中国驻苏使馆人员给我作了些片面的介绍，更增加了我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怀疑。

归国之后，我随马福祥参加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工作。以后担任了马鸿逵的驻南京代表。（我和西北马家的关系，后边再说。）

1937年秋间淞沪失守后，我的驻南京办事处迁到汉口日租界的南小路。恰巧八路军的办事处也距此不远。那时国共已再次合作，大家可以公开往来，我就先认识了董老，并且常常去拜访他。董老虽在百忙之中，也常常到我的办事处来。

最初，我抱着质疑的态度，向董老提出许多问题，并且和董老辩论。董老总是恺切地、不厌其烦地对我提的各种问题给予解答和分析。

他的循循诱导，消除了我许多疑虑，并且增长了很多见闻，使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不久，我又认识了新四军的罗炳辉将军。他因事由前线来汉，也住在八路军的办事处。由于住得很近，所以他在汉口住的那一段时间中，几乎每天都到我的家中来。我们谈的问题很多。在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提出各种各样的怀疑和各种各样的问题。看样子他并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后来知道他是奴隶出身），但他有丰富的生活实践和革命实践。他对我提出的各种问题，说明得非常中肯深刻，很有说服力，对我的帮助很大。

后来，到重庆后我又认识了周恩来。他的伟大，大家都知道，用不着我介绍。我们这些旧知识分子，又在国外读过书，一般都有些自负不凡，但和周恩来接触之后，往往都被他高尚的品德、渊博的知识和谦逊的态度所折服，从内心佩服他，我也是一样。徐冰同志在重庆时和我的接触较多，我也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和这些党内领导同志的接触，是使我从一个旧军政人

员转变过来向党靠拢的重要原因。

1941年初，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调动军队8万余人，突然包围并袭击奉命北调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以下数千人阵亡。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件事情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共合作的局面又濒于破裂的边缘。而中间的许多人士，也慌乱震怖，一时不知所措。

我当时心情非常沉重，认为这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事件，第三方面人士应该出来调解；也只有第三方面出来疏解，国共的关系才能不至于破裂。因此我就走访各党派的负责人，如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张申府等，于1月某日在重庆民生路我的寓所举行会谈。周恩来、董老、叶剑英也来参加，我主张对这个事件一定要弄清是非，双方对解决此事的最低条件，也要先弄个清楚，然后第三方面才能从中进行调解。当时大家发表的意见很多。最后决定由参加谈话的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一信，说明我们的意见，请他给以明白答复。并商谈另作一提案提请国民参政会讨论。给蒋的信由梁漱溟起草。

2月10日，我又邀请周恩来和沈钧儒、黄炎培、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继续商谈此事。以后中共方面提出了最低条件，蒋也有了复信。第三方面推出五个人即沈钧儒、黄炎培、褚慧生、张君劢、左舜生为代表，积极进行奔走调解，但由于国共双方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不能接近，所以在是年3月举行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时，中共代表没有参加。一直到11月第二届第三次会议时，才由董老一人出席。从此国共的关系也愈来愈恶化，直到旧政协的彻底破裂。

第三方面人士在调解新四军事件时，因为有好几次集会在我的办事处或我的家中举行，因而引起了蒋介石集团的不满。在一

次最高国防委员会议中，有人主张把我管制起来并通知马鸿逵撤销我的一切职务。幸亏当时梁寒操在座。他是孙科的亲信，是国民党的要员，又是我的朋友。他说："周士观的为人我清楚。他是名士派的作风，好请客，但对政治没有什么野心，而且是不大关心政治的。"经他的开脱，我才得免于无事。

从此以后，我就更加向党靠拢，并根据我的条件，为党做军事策反工作。

军事策反的工作，有成功，有失败。比较成功的是1947年2月，山东莱芜战役中整编四十六师师长韩练成的起义。他的起义使国民党山东第二绥靖区副司令长官李仙洲率领的60000多人，全部被解放军消灭。李仙洲本人和他部下许多高级军官也都或被俘虏，或被击毙。韩练成立了大功。

韩练成是甘肃固原人，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苦，曾为地主放羊数年。后来投效马鸿逵的部下当兵。由于他胆识过人，作战勇敢，所以在不数年之间就被提升为营长。然而他的过快的升迁，即遭到马鸿逵左右庸碌之辈的嫉妒，为他们所排挤，因此愤而离开十五路军，考入了南京军官学校谋深造。毕业之后被同学介绍到广西，担任了白崇禧的参谋长。抗战以后，他任国民党军的四十六军军长，属于桂系系统。

他担任高级军职以后，有一个时候又一度进入当时的最高军事学院学习。这时他夫妇就住在我的家中。我们交谊深厚，无话不谈，对国内的政治形势和其他不少问题的看法也极为一致。

他曾经和我研究他的出路问题。我们一致认为，他虽受白崇禧的信任，但桂系是个地域性极强的封建军事集团，一个甘肃人在桂系集团内绝难有大的发展。

他是军事学院的学生，就这种关系来说，他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学生，因而也可以走蒋的路子，和蒋搭上密切的关系。然而蒋的部下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互相倾轧；且腐化混乱，崩溃之势已成，决不能为他效命帮凶，并随而为其殉葬。

我们研究考虑之后，遂决定投靠中国共产党。由我联系安排，介绍他在我弟弟的家中和周恩来见面。

韩练成和周恩来见面后，受到了周恩来坦诚的接待和恺切的教导。韩练成也向周恩来恳切表示，他决心抛弃国民党，投靠人民，投靠中国共产党，愿意随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示，为人民立功，为革命效力。

正好这时蒋介石和白崇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蒋介石想趁机消灭桂系的力量，调韩练成担任海南岛的某某司令官，但又不许韩练成带他的四十六军随往，要他把部队交给别人。蒋介石的意思是想藉此夺韩的军权，同时又让韩到海南岛和原在岛上的革命武装冯白驹部互相冲突，同归于尽！

韩在接到蒋的任命之后，自然不愿走这条他不愿走的反动的道路，因而就一再和我研究应付蒋的办法，并要我向党请示，到海南岛后如何和冯白驹同志接线，以免彼此误会，自相残杀。

我认为韩的要求非常重要，即多次向董老商量请示办法，并向董老建议：除党和冯白驹联系之外，请董老派一青年党员，作为韩的部下，随韩南下，以便就地直接联系。经过向董老多次请示，董老决定派一青年党员王某（假名王平，此人真名张保恕，解放后在一机部工作）冒称韩练成的内侄，随同韩去海南岛。

韩练成到海南岛以后，很快就和冯白驹取得了联系。他们之间不断发生战争，并且战斗十分激烈，但都是对空放枪，实际伤亡甚少。而韩则藉此向蒋不断发电告捷，反而取得了蒋的信任，认为韩是能战可靠之将。

1947年初，韩练成又奉蒋的命令，被调往山东胶济路一带配合李仙洲部对解放军作战。韩路过上海时，又和我研究到山东后和解放军直接联系的办法。当时党在上海的公开办事机构都已撤退，留沪的地下工作人员和我又没有联系，一时无法进行。韩和王部十分焦急。经过辗转周折，才找到沈钧儒先生。我和沈衡老研究之后，决定用我的名义发一电报给指挥山东军事的陈毅司

令员，要他派人到青岛和“于冰”（韩的化名）联系。这个电报如何发出及陈总以后和韩如何联系，我都不清楚。但在山东莱芜战役中，如前边提到的，韩之所以能够立功，正是由于和解放军取得了联系之故。据以后韩练成告诉我，李仙洲部被消灭后，他在前线和陈总见了面。陈总问他：“你是留在这里呢，还是只身南下，继续为人民立更大的功劳呢？”他表示：留在那里无大用处，还是回南京好。于是陈总就秘密布置了一下，让韩练成独自打了回去，以掩蒋系的耳目。

韩练成从前线先到了徐州，即打电报给蒋，蒋即回电召他赴京。到南京后他又住在我的家中，并和我研究设法留在京中，以便刺探蒋方的最高军事机密。

蒋召见他后，向他详细询问了莱芜战役和他个人脱逃的经过。由于他的巧妙的对答，蒋对他并无怀疑，反认为他十分忠勇。对他说：“别人在战役之后都束手就缚，独你能甘冒危险，单身打出归来，实属难得。你的部队没有了，我另拨部队给你。”

韩的目的不在带兵，而在设法留京，所以就对蒋说：“这次惨败，威信尽失，实不适宜于带兵，更不适宜于再到前线打仗。学生要求留在委座身边，侍从学习，将来另图报答。”

蒋答应了韩的要求，派韩为他的侍从武官。韩虽担任蒋的侍从武官，但一直没有机会看到机密文件，觉得毫无意义，于是又设法转到何应钦所主持的国防委员会中工作。可是在国防委员会中也只能看到一些普通文件，不起什么作用。正在他十分苦恼的时候，恰巧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政长官。

张在担任西北行政长官之后，就决定建立六个警备旅，作为巩固西北的武装。因为韩是甘肃人，是最高军事学院的学生，又有治军经验，所以张就邀韩回省负责主持筹设警备旅的事情。韩到甘肃之后，建立了两个旅，用他的旧部陈学仲和李中充等担任旅长团长等职务。这些军官之中就有共产党员。

韩练成在甘肃不到一年，他和党的秘密联系已为蒋介石所发

觉。蒋电令张治中将韩扣押解京。张治中接到电报之后，就找韩练成谈话，并出示蒋的来电。张对韩说："在我这里是没有问题的，离开我这里就难免没有风险。希望你珍重。"

隔一天，张治中在长官公署设宴请客。长官公署的高级干部和蒋派在甘肃的特务都应邀参加。席间，张治中忽然回到办公室内写了一封信，墨迹未干，即当众交给韩练成，并说："这是一个机密文件，须向委员长当面请示，飞机已安排好，明天就走，得到委员长批示后就赶快回来。"

韩练成回到家中后觉得有些奇怪。把信拆开一看，原来只是当天的一张报纸，并无其他片纸只字。他知道张是让他逃走，遂发一电给我。飞机到后，我就把韩接到我的家中，当晚即陪同韩到了上海。但上海也并不安全。幸亏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参加过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一个半秘密性团体"仁社"。仁社在杭州、广州都有据点。我就送韩离沪赴杭，并分别电托"仁社"成员杭州电灯厂的金某、广州的彭传锟两人代为购买车票，安排住处，所以韩得以由杭州经浙赣路到广州，安全到了香港。

隔了一个多月，我又把韩的眷属也由上海送往香港。送眷属也并不容易，因为他的爱人没有上海居民证，而当时离沪赴港的，检查颇为严格，因此我就把我的居民证用药水洗了改作韩的爱人的居民证。但仍然有明显痕迹。于是就又用黄墨水在上边抹了一下，由我抱着他的一岁女儿走过检查口时，我一面出示户口证，一面说："刚才小孩拉屎在上边了，请原谅。"那检查员一听，就气得一摆手说："去！去！"我们就混过去了。

韩不久就由香港到了解放区，以后又入了党。解放后历任训练总监部部长，军事科学院秘书长、甘肃军区司令员、甘肃省长、宁夏军区司令员等职。

1949年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时，中共中央为尽量避免战争的损失，周恩来曾面嘱我和韩练成对马鸿逵等进行策反工作。经过我们的联系，马鸿逵部下的几个重要将领如卢忠良等以及马

鸿宾、马立青等都先后起义，为人民立了功。

在我所进行的策反工作中，没有成功的有以下几桩：

一是朱绍良。

朱绍良是蒋介石的重要高级将领之一。我和他比较熟悉，和他的亲信秘书赵和九尤有深交。1948年朱绍良被蒋介石任命为福建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是蒋介石准备撤往台湾的一着棋。如果他能够归顺，当然对解放台湾会有不少的方便，因而我找到了他。我对朱说："福建是我的故乡。你初来之时，我关心桑梓，确实希望你能够把福建整顿一下，创立一个新的局面。可是，现在国民党的崩溃，已是迫在旦夕，继续为蒋介石效命已经毫无意义。我希望你不要因对蒋氏一人的愚忠，而使福建省的数千万人民蒙受战争之苦。你的部下已有几个师长同意相机起义，归顺人民。希望你也能在此严重关头，认清形势，毅然和蒋介石断绝关系，站在人民一边。于公于私，两蒙其利。"

朱绍良说："蒋之为人，私心自用，我所深知。国民党政治腐败，民心丧失殆尽。崩溃之局，确已无可挽回。但我追随他数十年；他待我亦极厚。若于临危之时，背叛他而投降共产党，于心实所不安。此后如何，亦只有听之而已！"

朱虽然没有同意反正，但对我们策动的某师长沈某却也没有追问。

二是丁治磐。

丁治磐是张宗昌的旧部，当旅长的时候即和我相识，常有往来。张宗昌失败后，他投降了国民党，受到了蒋介石嫡系王耀武的知遇，逐步任到江苏省主席。1947年莱芜之战后不久，接着王耀武在济南被俘。我即通过丁的连襟刘印紫（常州人）劝丁反正。刘印紫是我的挚友，和丁治磐是至亲，因此我们可以无所不谈。

刘印紫和丁谈了之后，丁表示同意反正。丁并且说："我是王耀武的人，现在王耀武生死未卜。解放军宣传对王耀武十分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